

**俄罗斯文化问题研究**

## 诗意化的民族想象 ——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文本研究\*

宋羽竹\*\*

**【内容提要】**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使人们有机会窥见俄罗斯文学研究中西伯利亚文本的重要意义。该文本是十七世纪至今西伯利亚问题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的关于东征、苦役和生态的书写,分别从历史文化、信仰和生态伦理的维度,诠释了西伯利亚文本的内涵。西伯利亚被侵略、被奴役、被破坏的历史和现实,在文学文本中被想象为帝国的荣耀、天国的复活和家园的善治。想象以神话化、神圣化等诗意化的形象建构方式,有意识地塑造了理想的西伯利亚形象。在地理空间批评和文化地理学理论的观照下,西伯利亚文本中的想象,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在文学空间与地理空间的对照过程中表现出来,揭示了俄罗斯通过文学想象遮蔽社会问题、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意志。

**【关键词】**俄罗斯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文本 西伯利亚形象 俄罗斯文学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1-0147  
(30)

西伯利亚(Siberia, Сибирь)西起乌拉尔山,东临太平洋,北濒北冰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流派研究”(项目批准号:17BWW043)、黑龙江大学校级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17-011HLJU)的阶段性成果。

\*\* 宋羽竹,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

南至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山地、蒙古和外兴安岭，地处世界东方的亚洲，构成了俄罗斯西学东顾之东方视野。但并不是所有地理空间都能够成为文学巨擘青眼有加的对象，俄罗斯文学史上的西伯利亚已经超出了上述地理学范畴的描述。古代俄罗斯文学（十八世纪之前）中的《阿瓦库姆行传》，黄金时代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列夫·托尔斯泰的《叶尔马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死屋手记》，二十世纪文学经典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以及当代文学中索罗金的《蓝油脂》、《特辖军的一天》、雅辛娜的《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先钦的《淹没地带》等，使得西伯利亚不仅作为文学作品的叙事场进入读者的视域，甚至作为艺术主题、社会问题的载体、国家形象的名片，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它是沙俄帝国意志在东方的驰骋之地，是考验人性、激发革命思想的苦役之地，是信仰旧礼仪、期待基督降临的应许之地，是寄托俄罗斯未来的希望之地……文本的反复书写在西伯利亚大地上加盖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穹窿，诗意的想象使西伯利亚逐渐发展为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 一、西伯利亚文本：关于俄罗斯民族存在的诗意化想象

地理空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维度是由经纬、昼夜、山、川、湖、海等诸多自然因素决定的。在世界地图上，乌拉尔山在欧亚板块上的纵向一笔，划就了西伯利亚相对独立的生态空间，生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然地理风貌，面积超过中国、美国、巴西等地大物博的国家，人均资源占有量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居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重要地位。然而，并非一切地理空间都能够成为散发独特韵味的空间文本。站在俄罗斯的民族立场上来看，西伯利亚是顿河哥萨克部族和沙皇军队东部土地开发的光辉战果，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远播、“第三罗马”的布道，是历经现世苦难后可以被期许的复活之地，亦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家园。文学是审美的活动，美使现实的存在获得了无限的诗意的外延，这样，地理空间得以与“诗意栖居”产生关联。这也是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所认为的作家的天所在：“体验深度的生存空间，在文学空间的体验中沉入生存的渊薮之中，

展示生存空间的幽深境界。”<sup>①</sup>西伯利亚作为俄罗斯作家的叙事场，首先为寓于主人公形象的作家体验提供了诗性的生存空间，“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赋予了作家的个体身份归属，使作家的个体独立意识融入国族的文化想象之中。”<sup>②</sup>作家根据自己的生存体验，为西伯利亚“镌刻俄国精神烙印”<sup>③</sup>，使西伯利亚的地理空间笼罩在诗意化民族想象的穹顶之下。与此同时，叙事使地理空间获得了特定民族精神的观照，被塑造为具有独特意味的地理形象(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раз)。俄罗斯文化学者德米特里·扎米亚京(Д.Н. Замятин)指出，“作为文化领域基本现象学范畴的空间性，是借助地理形象和直接由地理形象本身而形成的。”<sup>④</sup>西伯利亚现象学空间性的获得，是因为它具备成为地理形象的要素：第一，俄罗斯文学书写了西伯利亚的现代神话，雷列耶夫、德米特里耶夫等人为叶尔马克冠以“民族英雄”的雅称，认为他是在抵御早先臣服莫斯科公国的西伯利亚汗国侵扰时被算计而亡的，是为俄罗斯开疆拓土之伟业牺牲的英雄。但是，有翔实的史料证明替沙皇东征打前站的顿河哥萨克叶尔马克及其部族的匪帮身份，以及他们曾在入侵西伯利亚汗国时烧杀抢掠。第二，西伯利亚的地理位置远离俄罗斯政权的心脏所在，生存条件严苛，是历史上著名的流放之地。分裂教派始祖阿瓦库姆、革命者十二月党人、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曾被流放至此，肥沃了西伯利亚思想启蒙的土壤，埋下了使其成为俄罗斯未来复活之地的种子。第三，这里业已成为新家园的象征，在俄罗斯国土范围内，西伯利亚是体量巨大的自然地理空间，与都市或其他生态区域相比，其自然力更能够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对抗，苏联时期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建设与当代俄罗斯东部生态破坏、人口流失、经济萧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引发了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等作家关于生态伦理问题的思考。

综合上述要素，西伯利亚形象已经不仅是对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审美

---

① 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② 同上，第139页。

③ [俄]别林斯基著：《文学的幻象》，满涛译，合肥：安徽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

④ 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的再现，更是将特定人群的普遍生存体验——民族存在——模态化的想象空间，“形象是存在的给予者。形象作为绝对想象力的纯粹创造，是一个存在现象，是言说的存在所特有的现象之一”<sup>①</sup>。俄语想象一词的构词似乎先于现象学道出了形象与想象之间的逻辑，вообразить（想象）由词根образ（形象）与前缀во-（建立）组合而成，想象即是建构形象。而“образ一词由动词резать（切割、雕刻）派生而来”<sup>②</sup>，也就是说，形象是人工雕刻的用以反映现实中某物的产品，这种产品进入俄罗斯文艺学理论视域之后，成为эйдос（相貌、样子）一词的同义表述。“自古以来，哲学家和学者们就是用‘形象’（在古希腊文中用的是эйдос，其含义是‘相貌、样子’）这一术语，来指称文学以及其他具有形象性的艺术门类借以实现自己使命的方式（手段）。”<sup>③</sup>按照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哈利泽夫（В.Е. Хализев）的观点，文学中的形象建构区别于概念逻辑形式对世界的把握，是感性把握世界的形式。<sup>④</sup>文学语言根据民族意识对现实世界的拓印，在作品中雕刻塑像，这种行为是主观而感性的，是基于民族立场而选择的实现历史使命的方式，这反映了想象的秘索思维度。俄语中同表想象之意的词汇мыслить由希腊语词mythos（秘索思）而来。作为话语的表达方式，秘索思由于缺省逻各斯（logos）理性的、近乎蓄意的扯谎而更显纯粹，被认为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所以，衍生自秘索思想象的西伯利亚思维（мышление）是对被呼唤的、被期待的民族存在——理想西伯利亚形象（идеальный сибирский образ）——的描摹。因此，匪徒、侵略、专制，因帝国伟业成为英雄和荣耀；流放与苦役中炼狱般的苦难，可以被神圣为通向自由与天国的阶梯；原始的自然和破败的乡村也被寄予美好家园的愿景，现实因想象散发出诗意。所以，在俄罗斯历史文化语境中，作为建构形象的想象，一方面具有民族的主观性，另一方面呈现出神话化、偶像化、理想化的虚空性。美国民族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使

① [法]加斯东·巴什拉著：《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94页。

② Шанский Н.М.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нлайн-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4.05.2018. <https://shansky.lexicography.online/o/образ>

③ [俄]哈利泽夫著：《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④ 详见[俄]哈利泽夫著：《文学学导论》，第118页。

民族共同体彼此区别的基础，正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sup>①</sup>俄罗斯文学在西伯利亚形象建构过程中隐藏的独特秘索思世界和民族思维中的虚空性，使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与中国古代的西伯利亚、原住少数民族的西伯利亚区别开来。据《新唐书·回鹘传》记载，“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濒小海……贞观二十一年，因骨利干入朝，亦以使通中国。”<sup>②</sup>唐朝称贝加尔湖为小海，称叶尼塞河为剑河，所设立的军政机构安北都护府<sup>③</sup>的管辖区域包括现在俄罗斯的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以及安加拉河和贝加尔湖地区，部落史称都播、黠戛斯、骨利干等，该区域在元朝时期归属岭北行省。<sup>④</sup>在此居住的原住民图瓦人、布里亚特人等虽是游牧民族，但受中国影响较大，尤其是布里亚特人较早进入封建社会，积极抵抗了17世纪30年代的沙俄殖民活动。古代中国的书写将西伯利亚南部地区视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族多样化的一部分，反映了“和而不同”的儒家思想；原住图瓦人、雅库特人、布里亚特人等民族的神话，则强调他们自己是西伯利亚真正的主人，这一万物各有主神的空间是他们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生产生活的精神供养；而对于俄罗斯而言，神话化的帝国想象与神圣化的宗教体验调动了俄罗斯人民的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使西伯利亚获得了比边界划归更有力量的俄罗斯民族思想认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是地缘突围的帝国意志、控制东方的东正教情绪、以及深入亚太的“亚洲战略”<sup>⑤</sup>的写照。

根据西伯利亚形象建构方式的特征，西伯利亚文本有三个重要维度：首先是历史文化维度，十八世纪以来的东征文本，分为沙皇的帝国东征和思想的帝国东征两个方面，这是西伯利亚身份逐渐合法化的过程。历史事实经过神话化的书写，文化共生理念反观了帝国思想的扩张性，从中我们得以透视出俄罗斯不囿于历史范畴的帝国想象，这是在建构具有殖民性质的理想文化形象。第二个维度是信仰维度，苦役文本贯穿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历史阶段始

---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4页。

③ 详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32-33页。

④ 详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第5-6页。

⑤ 王海运：《新世纪的俄罗斯》，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

终，它见证了革命接连爆发的二百年，是历史上国家意志的直接结果，与俄罗斯的民族觉醒、思想启蒙相关。作家们着眼于人民在流放、苦役中经历的苦难，将其诗意化为升入天国的宗教体验和获得新生的信仰重塑，建构了苦役-复活的逻辑。第三个维度是生态伦理维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生态文本反映了东部土地开发引发的生态问题，随着乡村废墟、工业废墟的不断出现，俄罗斯民族将以何种生存状态在西伯利亚延续下去，成为这类文本的主要论题。自然与道德生态和谐的家园想象，是生态文本书写的伦理追求。

基于这三个维度，我们尝试探索西伯利亚文本符号下掩藏的俄罗斯关于这一区域的思想动态。首先，丰富资源的客观吸引力与沙皇攫取资源的主观帝国意识，使得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成为俄罗斯志在必得的目标粮仓和宝库。攻克西伯利亚汗国后，进入东北亚的门户被打开，西伯利亚地区作为战略要地的地位，逐渐在俄罗斯民族的意识中明晰起来。土地开发和思想统治成为沙皇时期、苏联时期以及当代俄罗斯政权的重要内容。但是，苏联时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生态问题的凸显与日益严峻，使得俄罗斯人民反对罔顾生态伦理的经济建设和极权政治的呼声更加激烈。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成为当代俄罗斯面临的艰巨课题。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的经济“征服”，以及由该基础决定的思想、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征服”，要比武力征服迟得多，也复杂得多。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文本，实际上是作家们根据自身经历想象的、力求达到上述“征服”的理想方案，其思维模式与俄罗斯政权对待区域问题采取的国家行动效果存在一定距离。

想象生产了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人关注的“社会的”空间，这种“社会的”实际上就是人造的、关系的，“艺术形象……要浓缩、提炼出那些作者认为十分重要的生活的不同方面，以期反映出作者对生活的评价性的审视与思索。进而，艺术家的想象……是于作品中在场的某种客观现实。作品中不乏虚构的（或者说，至少是推测出来的）物象，并不与现实完全吻合的物象。”<sup>①</sup>西伯利亚文本中那些与现实存在相当距离的民族想象，观照了国家历史和民族思想的沿革，诗意化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美化了俄罗斯社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使想象之于现实虚空而无力。我们借助文化

---

① [俄]哈利泽夫著：《文学学导论》，第119页。

地理学的学术方法，使那些在时代变迁过程中被风化的民族地图和文化地图得以复现，本文所做的研究将透过诗意化民族想象的滤镜，深入剖析西伯利亚文本符号的实质内涵。

## 二、东征文本中的帝国想象

西伯利亚东征文本的核心之一，是叶尔马克率部入侵西伯利亚汗国的历史事实。其中的诗意化是通过神话书写来实现的，神话书写利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有意识地建立了有秩序的、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庙宇。其中供奉了普适而重要的民族思维，从而使文学文本在特定民族范围内获得了真理的效力，成为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sup>①</sup>东征文本中的神话书写，以沙皇俄国东征西伯利亚的历史事件为原型，在叙述过程中赞颂了俄罗斯民族勇于开拓、无往不利等符合“第三罗马”帝国想象的民族气质。但事实上，这些赞颂是对好战性格、残暴行为、殖民主义的诗意化，目的是通过神话化的形象建构方式，遮盖或合法化侵略西伯利亚的历史暴行。东征文本中的神话化，分为两个路径，一是对西伯利亚东征头目——顿河哥萨克叶尔马克——的神话化，<sup>②</sup>二是对东征殖民行为的神话化。

站在俄罗斯民族立场之上，叶尔马克东征与伊戈尔远征的意义如出一辙，都被认为是反抗外族侵略、保卫俄罗斯的爱国战争；而站在西伯利亚汗

---

①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② 俄罗斯文学史上以叶尔马克东征为题材的作品主要有：十八世纪：斯罗夫佐夫（П.А. Словцов）的剧作《叶尔马克》（Ермак）、拉吉舍夫（А.Н. Радищев）的史诗《叶尔马克记》（Слово о Ермаке）、德米特里耶夫（И.И. Дмитриев）的史诗《叶尔马克》（Ермак）等；十九世纪：普拉维利希科夫（П.А. Плавильщиков）的悲剧《叶尔马克》（Ермак）、雷列耶夫（К.Ф. Рылеев）的民歌《叶尔马克之死》（Смерть Ермака）、波列沃依（Н.А. Полевой）的剧作《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或伏尔加河与西伯利亚》（Ермак Тимофеевич, или Волга и Сибирь）、达维多夫（Д.П. Давыдов）的民歌《征服西伯利亚》（О покорении Сибири）、列夫·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叶尔马克》（Ермак）等；二十世纪：巴若夫（П.П. Бажов）的童话《叶尔马克的天鹅》（Ермаковы лебеди）等。

国的立场或者史学家的客观立场，叶尔马克一众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这一过程中的烧杀抢掠证明了他们是西伯利亚灾难的始作俑者。列夫·托尔斯泰（Л.Н. Толстой）在历史故事（история）《叶尔马克》（Ермак, 1875）中这样描述：

六百名哥萨克在叶尔马克的带领下来到斯特罗戈诺夫家。斯特罗戈诺夫先叫他们去打附近的鞑靼人。哥萨克们把鞑靼人打跑了。后来因为闲着没事，他们就在这一带打家劫舍。<sup>①</sup>

叶尔马克等人实际上是封建庄园的打手，通过维护庄园主的利益维持生计，他们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海盗性格，游手好闲，蛮横好战。雷列耶夫（К.Ф. Рылеев）在诗歌《叶尔马克之死》（Смерть Ермака, 1822）中把这种性格歌颂为献身俄罗斯的无畏精神：

他不吝自己的生命，  
在盗抢时恶意掠夺，  
难道他会吝自己的生命，  
在为俄罗斯献身之时？<sup>②</sup>

显然，东征哥萨克们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都与帝国思维中的神圣形象存在距离。人而圣之的神圣化是通过叶尔马克之死的神话实现的。据相关史料记载，叶尔马克率部在夺取库尔拉拉要塞的战斗中失败，宿营在额尔齐斯河边的军队遭到库程汗<sup>③</sup>及其精兵的突袭，叶尔马克在突围上船时不慎坠河，沉重的盔甲使他沉入河底，库程汗将其尸体打捞出来后实施报复性的凌辱，这一行为既遭到了鞑靼人的唾弃，又引起了俄罗斯人的愤怒和对叶尔马克的同情。<sup>④</sup>对于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而言，叶尔马克死后被凌辱引发了他们对耶稣为人类受难的联想（虽然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其死亡的偶然事件获得了为民族事业受难的神圣意义，被视为崇高的牺牲和献身。叶尔马

---

①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叶尔马克》，陈馥译，收入刘开华主编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② Рылеев К.Ф. Смерть Ермака. 26.08.2018. [https://istihi.ru/ryleev/smert\\_ermaka](https://istihi.ru/ryleev/smert_ermaka)

③ 库程汗是西伯利亚汗国的首领，又译作库丘姆汗，后文不再一一指出。

④ 详见：[德]G.F·米勒、彼得·西蒙·帕拉斯著：《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李雨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9页。



克的匪首身份和殖民行径因此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忘却，所以，关于叶尔马克东征的悲剧也大多以此作为戏剧冲突展开。列夫·托尔斯泰在《叶尔马克》中描写了哥萨克们遭到西伯利亚汗国暗算的系列事件，赞颂了他们背水一战的牺牲精神，对死于额尔齐斯河的叶尔马克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将他塑造成民族英雄的形象，给予这个匪帮首领一个为帝国梦牺牲的受难者的神圣身份，使其褪去人的凡俗，圣之为民族思想中的神。而在德米特里耶夫(И.И. Дмитриев)的抒情颂诗《叶尔马克》(Ермак, 1794)中，类似的神圣化是在两位萨满的对话中完成的。萨满是西伯利亚原住民万物有灵世界观中沟通神与人的存在，借他们之口赞颂、同情叶尔马克，使这一形象有机会成为为原住民带来福祉的神。萨满以俄罗斯多神教信仰中的众神之首雷神比喻叶尔马克(слава грозна Ермака)<sup>①</sup>，又通过滚滚天雷营造天怒人怨的氛围，谈话在奔腾的额尔齐斯河边展开，这是民族战士叶尔马克牺牲的地方，作为尘世之人的他逝去，然而，作为偶像之神的他诞生了。这样的景象也出现在雷列耶夫的笔端，当额尔齐斯河的巨浪涌出了叶尔马克的尸体，“乌云翻腾，暴雨倾盆，远处也电闪雷鸣，密林也狂风骤。”<sup>②</sup>神话化的书写为想象提供了更大的虚构空间，叶尔马克之死在文学作品的诗意化处理过程中，获得了东正教思想中人而圣之的必要条件——受难，又遮盖了妨碍帝国蓝图塑造悲剧英雄形象的匪徒行径。

叶尔马克之死也被视为沙皇进入西伯利亚的重要转折，其神圣化带来的同情与崇敬为沙皇的殖民事业提供了助力。从此，一支又一支沙皇军队沿着叶尔马克探寻过的进军道路向东长驱直入。在1649年建立鄂霍茨克堡和1652年建立伊尔库茨克之后，“1710年，彼得大帝把西伯利亚变成他的第一批行省之一，省会设在托博尔斯克。”<sup>③</sup>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从欧洲到太平洋、从中国北部至北冰洋沿岸的西伯利亚远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称是俄国人的叶尔马克，在列夫·托尔斯泰笔下始终是哥萨克人，西伯利亚汗国的居民

---

① Дмитриев И.И. Ермак. 27.05.2018. <https://rvb.ru/18vek/dmitriev/01text/01liricpoems/004.htm>

② Рылеев К.Ф. Смерть Ермака. 26.08.2018. [https://istih.ru/ryleev/smert\\_ermaka](https://istih.ru/ryleev/smert_ermaka)

③ [英]马丁·吉尔勃特著：《俄国历史地图集》，任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4年，第11页。

被统称为鞑靼人：

叶尔马克说：“我们俄国人来了……”<sup>①</sup>哥萨克人大怒，他们奋力冲上去，把一路碰到的鞑靼人都打死了。<sup>②</sup>

至少在俄罗斯民族思想层面，西伯利亚并没有在进入沙皇俄国版图之前就获得俄罗斯民族的思想认同，包括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信中请求哥哥帮忙周旋，脱离在西伯利亚非俄罗斯的困境：“能否在一两年后让我去高加索？——那里毕竟是俄罗斯……”<sup>③</sup>契诃夫也在《萨哈林旅行记》中感叹：“这里的生活距离俄国多么遥远……自然界，那也是独特的，非俄罗斯的……道德，在这里也有自己的一套，也不是我们俄国的。”<sup>④</sup>列夫·托尔斯泰在《叶尔马克》的末尾强调，叶尔马克虽然攻入了西伯利亚汗国，但是至死没有使其归顺，这一功劳是沙皇的：第二年，沙皇的军队来了，鞑靼人才归顺。<sup>⑤</sup>

作家既想把打头阵的叶尔马克塑造成为帝国梦服务的民族英雄，又想将开拓疆土的功劳归于沙皇，却难以承认哥萨克的帝国战士身份，这一点在巴若夫（П.П. Бажов）的童话《叶尔马克的天鹅》（Ермаковы лебеди, 1940）中得到了诗意化处理。童话中的叶尔马克是斯特罗戈诺夫庄园农奴季莫费伊·阿列宁的小儿子瓦西里，有纯正的俄罗斯民族血统，成年后的他伟岸而智慧，被斯特罗戈诺夫喻为舵手，深受爱戴和尊敬，又因曾救过两只天鹅而被尊称为“我们的天鹅”（Наш лебедь）。在俄罗斯语言文化语境中，天鹅象征忠诚的俄罗斯卫士，但巴若夫笔下的天鹅寓意并不止于此。瓦西里在得罪了斯特罗戈诺夫家和当地军官之后，为躲避追捕当了顿河哥萨克的首领，改名为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他的功绩不限于保卫祖国，更为伟大之处在于开启了西伯利亚土地开发的历史纪元。“如果没有天鹅的帮助，他绝不会

---

①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叶尔马克》，第94页。

② 同上，第95页。

③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郑文樾、朱逸森译，收入陈燊主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书信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④ [俄]契诃夫著：《萨哈林旅行记》，刁少华、蒋长斌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

⑤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叶尔马克》，第98页。

找到通往西伯利亚的水路通道”。<sup>①</sup>巴若夫不仅认为叶尔马克如天鹅般护卫了俄罗斯原有的土地，更是为俄罗斯民族觅得西伯利亚新大陆的领路人；他笔下的叶尔马克不仅被诗意化为有纯正血统的俄罗斯英雄，更超越了人的形象，被神话化为民族偶像、守卫国土的卫士、新大陆的开拓者；这一形象不仅经历了人而圣之的“成长”，还经过了从哥萨克人到俄罗斯人的“洗礼”，见证了美化殖民意图的帝国想象，将征讨视为荣耀。

在叶尔马克被尊为开拓者的同时，我们不难看出东征文本中将侵略行为诗意化的方面。“开拓疆土是俄国史中的主要事情”<sup>②</sup>，俄罗斯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В.О. Ключевский）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俄罗斯历史的殖民性。在后续的论述中，史学家又为“开拓疆土”加注了土地开发的阐释。然而，当今世界对俄罗斯历史的普遍印象，却如文化史学专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所描述的那样，“斯拉夫人的历史是一部远征史——他们进入高加索、土耳其斯坦、乌拉山区及西伯利亚，其殖民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天，每一年，斯拉夫人都都会注入新的血液”<sup>③</sup>。西伯利亚在被征讨入俄之时，还没有彰显出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那种土地开发的势头。随着沙皇逐步在此设立要塞，以及后来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和投入使用，客观上才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土地开发。就东征西伯利亚的本质而言，殖民性是毋庸置疑的。早在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之前的十一世纪，诺夫哥罗德公国的居民就被乌拉尔山以东盛产毛皮兽的传言所吸引，并与之进行毛皮交易。诺夫哥罗德公国还通过军事手段向该地区原住民强制征税，并将其纳入诺夫哥罗德公国的行政区划。<sup>④</sup>在伊凡三世大公统治的莫斯科公国时期，“由于需要更多的土地和统治东西伯利亚海附近的萨莫亚季人，或称萨莫耶德人，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于

---

① Бажов. П.П. Ермаковы Лебеди. 27.05.2018. <http://vseskazki.su/avtorskie-skazki/skazki-bazhova/ermakovy-lebedi.html>

② [俄]克柳切夫斯基著：《俄国史》（第一卷），张草纫、浦允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2页。

③ [俄]威尔·杜兰特著：《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上），台湾幼狮文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470页。这里的乌拉山区指乌拉尔山区。

④ 详见：徐景学：《西伯利亚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5-96页。

1499 年向尤格拉地区派出了两支力量雄厚的军政队伍。”<sup>①</sup>到了伊凡四世统治时期，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国家对土地和人口的需求，将越过乌拉尔山去征服广袤的东方提上了沙皇的帝国日程。但是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伊凡四世对西伯利亚汗国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镇压鞑靼人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造反：库丘姆早先臣服俄国沙皇，后来造反了，扬言要洗劫斯特罗戈诺夫的集镇。<sup>②</sup>

据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史料记载，“1572 年至 1782 年间，库丘姆汗攻入俄罗斯边界超过五次”<sup>③</sup>，这似乎为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民族立场提供了史学依据。然而，作家却在后文的叙述中暴露了沙皇政权赤裸裸的殖民意图：我们俄国人来了，要征服你的王，占领他的城，叫他臣服俄国皇上。<sup>④</sup>

史学著作强调，伊凡四世接受了双头鹰的图腾，宣称自己位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成为“全罗斯的统治者”。在 1552 年攻取喀山之后，西伯利亚汗国成为沙皇俄国最近的目标，沙皇应当对其行使自己的神圣主权。<sup>⑤</sup>显然，征服西伯利亚汗国的最根本原因，是日益膨胀的帝国对外扩张的需要，东征并非守卫俄罗斯，而是对外侵略的殖民活动，促使空间争夺的原动力是扩充领地，并借此获得更多有利于帝国统治的资源。在列夫·托尔斯泰笔下，沙皇在允准斯特罗戈诺夫夺取西伯利亚汗国的旨意中，也明确过对土地和人口的需求：你们要是有力气，就把库丘姆的土地夺过来。不过可别把一大批人从俄国拐带出去。<sup>⑥</sup>

“夺过来”（отобрать，抢夺）和“拐带出去”（сманивать，诱拐、拐带）两个谓语，揭示了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土地和人口的强烈统治欲望。另外，列夫·托尔斯泰还用文学的笔法，为殖民加上了类似于克柳切夫斯基所述的“土地开发”的注释。在《叶尔马克》中有一段叶尔马克与鞑靼

---

① Радищев А.Н. Сокращенн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о приобретении Сибири// Радищев А.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ом 2).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41. С. 148.

②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叶尔马克》，第 91 页。

③ Олех Л.Г.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Феникс, 2013. С.63.

④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叶尔马克》，第 94 页。

⑤ См. Олех Л.Г.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С.63.

⑥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叶尔马克》，第 91 页。

人陶济克的对话：我们的枪能把树打穿，你们的弓箭可就不行了。<sup>①</sup>

这说明西伯利亚汗国的铁器落后于沙俄的火枪，作家据此认为，叶尔马克的入侵客观上推动了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开拓者形象无可厚非。列夫·托尔斯泰秉承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历史进行了相对客观地再现。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出他维护“神圣罗斯”理念的痕迹，殖民行径在作家类似的主观意愿下，被诗意化为实现俄罗斯民族帝国之梦的伟业。但事实上，叶尔马克率部东征是迫于沙皇的通缉，作为匪徒的他无处逃遁，在受到斯特罗戈诺夫家招募之时，企图通过攫取西伯利亚汗国而立功，将自己原本不合法的勾当变成合法的营生。想象选择性地抹去了存在于地理空间之中的部分现实，在意识中建立起了一个由形象构成的意指世界。西伯利亚东征文本极力遮蔽甚至忽视东征的殖民性，却暴露出俄罗斯帝国想象中的扩张本性。作为民族本性，这是“文化上富于创造性的、空想的、积极创造的一面。”<sup>②</sup>马克思曾指出，“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sup>③</sup>透过将土地开发视为莫斯科“第三罗马”历史使命的西伯利亚东征文本，被诗意化遮蔽的帝国殖民本质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内涵。俄罗斯民族不但从拜占庭帝国接过了东正教的衣钵，还继承了源自基督教十字军东征那种控制东方的情绪。历史事件虽然具有偶然性，却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与沉淀过程中，显示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帝国意识常量，武力的东征得以演变为思想的东征。

“叶尔马克把西伯利亚赠送给俄罗斯国家。但同时，哥萨克自由逃民（其中包括某些阶层）是俄罗斯历史中的无政府主义因素，他们与国家的专制制度和专横霸道是对立的。”<sup>④</sup>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Н.А. Бердяев）将殖民诗意为馈赠的同时，又提醒我们关注西伯利亚东征文本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反专制思想，亦即从专制的西方转向自由的东方。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观点

---

①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叶尔马克》，第94页。

②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③ [德]马克思著：《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7页。

④ [俄]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1页。

点，叶尔马克东征是为了逃离沙皇专制，走向自由。然而事实上是，哥萨克们东征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反而帮助沙皇政权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践行了专制。当代俄罗斯作家索罗金（В.Г. Сорокин），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了西伯利亚地理空间之于该问题所呈现出来的特殊性，提出“转向东方”<sup>①</sup>的观点，并强调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sup>②</sup>的转向。“《蓝色油脂》中出现的西伯利亚俄罗斯-中国共生理念绝非偶然，而是必然”<sup>③</sup>。这种必然当然与作家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密不可分。青年时代的索罗金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日本等东方文化，汉字、佛教等元素都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东方文化显然已经成为索罗金笔下十分重要的文化符号。更重要的是，这种必然还与当代俄罗斯的文化焦虑有关。按照上文我们提到过的别尔嘉耶夫的观点，哥萨克进入西伯利亚是因为对自由的向往，这意味着西伯利亚是远离沙皇专制、象征自由的空间。在索罗金笔下，器物可以由西伯利亚制造，也可以由中国制造，然而，雪的气息、提炼出的蓝色脂肪、关于俄罗斯未来的预言等，那些涉及俄罗斯精神内核的元素必须是纯粹的俄罗斯制造。例如，在《蓝色脂肪》（Голубое сало，1999）和《特辖军的一天》（День опричника，2006）中，未来的西伯利亚空间已经是一个使用掺杂汉语的俄语进行交流的地方，这里的叶尔马克空港大楼是中国造，汽车是中国造，这里的实验室中诞生了蕴含生命秘密的蓝色脂肪，这里的女巫通晓古今，可以预知俄罗斯的未来……反对极权的索罗金在西伯利亚的地理空间中营造了一种文化共生或者是文化狂欢的气氛，以示未来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将是一个自由的、兼容并包的、反对专制的文化空间。但是，作家又表达了他对于这种文化“共生”的焦虑，在俄罗斯经典画作前，“你会觉得俄罗斯的气息从墙上直向你扑来。你会忘记种种烦恼。你的肺吸进的是俄罗斯的空气。除此之外就什么也不需要了。”<sup>④</sup>而在满是中国风陈设的房间里，却是“一股难闻的东方香味扑鼻而来”。<sup>⑤</sup>仿佛在作家笔

---

① 任光宣：“文学是最烈的毒品——俄罗斯作家索罗金访谈录”，《外国文学动态》，2012年第6期，第10页。

② 同上。

③ Сорокин В.Г. Мы все отравлены литературой. 29.05.2018. <http://www.arba.ru/art/849/7>

④ [俄]弗拉基米尔·索罗金著：《特辖军的一天》，徐振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164页。

⑤ [俄]弗拉基米尔·索罗金著：《特辖军的一天》，第25页。

下，东方总是散发着难以令人习惯的气息，俄罗斯并不能敞开心扉地接纳东方那与俄罗斯精神相异的气质。文化共生的愿景恰如叶尔马克当年向往自由的东征宏愿，在东西对抗的文化现状中无法实现。索罗金在作品中引入了诸多东方形象，以此形成对抗专制的力量，以达成文化共生的平衡。但是正如作家本人也承认的，“只要特辖军还活着，俄罗斯也就活着”<sup>①</sup>，俄罗斯的延续正源自这种自古而来的帝国气质，文化共生仅仅是诗意化的表象，正如叶尔马克的侵略成了自由，特辖军骇人的专制罪行成了保卫祖国的壮举，内在的帝国想象使西伯利亚无法从实质上成为自由的文化共生空间，帝国之鹰不会熄灭垂涎东方的目光。

### 三、苦役文本中的天国想象

远离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地理位置和原始的自然环境，使得西伯利亚成为生存条件严苛的天然流放地。1586年起，在托博尔斯克要塞建成后不久，新设的刑事法庭接收了首批发往西伯利亚的流放犯人。自此，对抗政权的社会活动者们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使这里成为被政权离弃的空间。一方面，这里偏僻辽远，不会对远在欧洲部分的沙俄政权造成威胁，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西伯利亚土地开发的需要，流放犯也是强制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沙皇统治退出历史舞台，流放制度被废除，但是西伯利亚的苦役并没有结束。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时期，被剥夺财产和生产资料的富农被强制遣送至西伯利亚服苦役，进行劳动再教育，遣送路线与沙皇统治时期的流放路线并无二致。究其本质而言，强制遣送是作为封建残余的流放制度在苏联时代的延续。无论是流放还是强制遣送，沙俄政权和苏联政权都希望通过西伯利亚苦役的形式达成某种“转变”：首先，政权希望被流放、被遣送者在苦役的惩罚之下臣服于政权，历史上叶尔马克东征的侵略史已经将西伯利亚定位为臣服沙俄政权的他者之地，使流放者向归顺政权的方向转变，是俄罗斯帝国意志的需求；另外，政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补充所实行的政策对移民吸引力不足的情况，强制向西伯利亚待开发地区输送移

---

<sup>①</sup> [俄]弗拉基米尔·索罗金著：《特辖军的一天》，第251页。

民，并期待他们服役期满后能够留在那里，转变为国家建设的生产力，使西伯利亚成为象征俄罗斯新生的希望之地。然而，在非国家意志层面，苦役生活推动了人们精神上的蜕变，这种蜕变观照了以宗教信仰和民族信仰为基础的俄罗斯思想演变，这种演变是与俄罗斯国家意志相对抗的。正是在这样的对抗过程中，旧制度、旧思想被逐渐瓦解，促进了东部地区的思想启蒙和土地开发，这是客观上取得民族进步的转变。所以，西伯利亚苦役是俄罗斯历史上，尤其是西伯利亚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牵涉到这一地区由鸿蒙转向觉醒的过程。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分裂教派代表人物阿瓦库姆、农民起义的代表普加乔夫、社会活动者十二月党人、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革命者列宁，以及许多普通的俄罗斯人都先后在西伯利亚服过苦役，由此诞生了一系列优秀的思想和文学作品。远俄之地的西伯利亚成为文学中象征俄罗斯觉醒之地的形象，苦役文本也因此成为与俄罗斯信仰密切相关的文化符号。

俄罗斯文学中的苦役是通过诗意化的想象与信仰建立联系的，饭菜的粗劣、身上的镣铐、难挨的岁月、受压迫的心灵……是苦役生活中苦难的具象，没有人情愿活在这样的苦难之中。但是，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苦难可以被想象为通向自由天国的途径。普希金在《致西伯利亚的囚徒》（Во глубине сибирских руд，1827）中，把苦难比作希望的忠实姐妹，鼓励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要坚信革命会卸掉枷锁，冲破牢狱，迎来自由的国度。这一主题中包含了基督教的神学逻辑，即苦难是通往天国的阶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真命题，原因是它的源文本《圣经》是被基督教世界奉为圭臬的神圣文本。《圣经·新约》中的四部福音书，关于耶稣受难有详细的叙述，耶稣在被吐唾沫、荆棘加冠、戏弄和讥诮后被钉上十字架……所受之苦通过上述偶然事件表现出来、但综合耶稣出生、受难、复活的过程来观察，受难不单纯是偶然事件，更是上帝设局中的必然事件，传达出基督教核心的神学思想，“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sup>①</sup>即按照上帝的旨意，遭受苦难直至死亡是拯救生命、达成复活、升入天国的必经之路。苦难因此被神圣化，文学中关于苦难的诗意化想象也正是遵循这种路径展开的。未曾去过西伯利亚的普希金，并未道出西伯利亚苦役与普遍

---

① 《圣经·新约》：《马可福音》，8：35。



的苦难之间的区别，《阿瓦库姆行传》、《死屋手记》以及《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等作品，则对二者之间的区别有鲜明的体现。上文我们提到了西伯利亚远俄的地理位置和流放史，证明了这里是被居于欧洲部分的政权离弃的空间，这里的苦役与俄罗斯普遍苦难之间的区别，正在于关键词“离弃”。在社会政治层面，西伯利亚是被政权离弃之地，是与政权对抗的空间。列宁正是经历了西伯利亚流放之后，才带领布尔什维克开启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时代。俄罗斯作家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В.В. Ерофеев）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Москва-Петушки，1970），以主人公韦涅奇卡的旅行起点——库尔斯克火车站<sup>①</sup>，作为这段具有革命意义的流放的隐喻。韦涅奇卡精神方面的流离失所，一方面反映了他被政权离弃的无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宗教体验过程中得以接近信仰的欣慰。在宗教体验层面，被政权驱逐至西伯利亚经受生存考验的人们，使这里有机会成为被上帝拣选之地，现实的苦难使牢狱中的人们更加向往救赎，对基督再次显现的期待给予西伯利亚成为天国的可能，犯人们借助这种宗教体验达到心灵的慰藉；在心理层面，西伯利亚的苦难有着离弃旧时自我的死亡意味，新生活的展开是独立人格重塑过程中的信仰觉醒。坚守信仰弥补了现实和精神层面遭到离弃的失落感，信仰觉醒则使苦难获得了积极的意义。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阿瓦库姆行传》（Житие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 им самим написанное，又译作《阿瓦库姆生活纪》，下文简称《行传》）首次以审美的文学形式记录了西伯利亚的苦役生活。阿瓦库姆是分裂教派（раскольничество，也叫作旧礼仪派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的大司祭，在大牧首尼康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中作为分裂势力败下阵来，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以阿瓦库姆为首的教派之所以被称作分裂教派，是因为该教派与尼康的改革派分别象征着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两种冲动——固守传统与学习西方。阿瓦库姆被流放西伯利亚这一历史事件，反映了学习西方的暂占上风，宣示了当时沙俄政权的战略选择，即以尼康所倡导的东正教新仪规达到与国际接轨的目的，这种战略选择迎合了沙俄政权对于扩大“第三罗马”影响力的需求。阿瓦库姆及其教派虽然遭到当时政权的离弃，却将旧礼仪信仰远播西伯利

---

<sup>①</sup> 1897年，列宁从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火车站出发，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西伯利亚流放。

亚，在此寻找到隐秘成长的温床，与尼康的改革派形成了东西之争、内外之峙的情势。《行传》记录了阿瓦库姆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艰辛，在被政权离弃之时，他选择了通过坚持旧礼仪信仰来接近上帝，尘世的苦难在坚守信仰的过程中得到慰藉：

哦，满目群山！高高的群山，难以逾越的密林，石壁悬崖似高墙耸立，望一眼即头晕目眩！山中有巨蟒爬行；那群山中亦见大雁野鸭飞翔，美丽的羽毛，黑色的乌鸦，灰色的慈鸟；山中亦有各类鹰隼、火鸡、蝴蝶、天鹅，及其他野禽，数不胜数。那群山中亦见各种野兽：羚、鹿、野牛、狐狸、野猪、野羊、狼，——近在我们眼前，却无法抓获！帕什科夫驱我进山，与此等野兽、蛇莽及飞禽同行。<sup>①</sup>

飞禽极多，大雁和天鹅浮在湖面上，宛若白雪，缓缓游动……水中鱼儿亦极多，鲟鱼和鳊鱼如此之肥，竟无法煎烹：锅中肥油满溢。这皆基督为人所造，以使人虔诚忏悔，颂扬上帝……<sup>②</sup>

阿瓦库姆以群山密林比喻西伯利亚流放时被帕什科夫折辱的千难万险，对苦难的感知来自于尘世的视角。与此同时，阿瓦库姆凭借对旧礼仪信仰的坚持而接近上帝，以上帝的视角得观贝加尔湖宽广的湖面，颂扬上帝的造物，描绘了物产丰富、各色生命灵动的西伯利亚自然图景。<sup>③</sup>虔诚忏悔也是旧礼仪仪规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大司祭曾指出，“在我们之正教信仰中，不可无忏悔；在他们之罗马信仰中，却不注重忏悔”。<sup>④</sup>对忏悔传统的坚持，使阿瓦库姆在西伯利亚自然中感受到基督的降临。虽身处偏远苦难的大地，心灵却已得到救赎，升入天国。这种诗意化的想象决定了《行传》不仅是珍贵的史料和地质勘探文献，还是极具文学性的西伯利亚文本，生产了一种思维模式：人们被尘世中的政权离弃，更加渴望接近上帝，通过信仰的心灵慰藉作用来度过苦难，苦难的空间在文学想象的诗意化过程中，成了形而上的天国。

---

① 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② 同上，第161页。

③ 详见 Дёмин А.С. 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сти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8. С.57.

④ 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第175页。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个名叫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可怜人，在最初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时，却没有如阿瓦库姆那般幸运得以接近上帝。他所承受的苦难在于无法在心里承认自己有罪，“他不是因为剃光了头和戴上了镣铐而感到害臊，而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创；使他害病的也是那受了重创的自尊心。”<sup>①</sup>他无法理解那种“非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命中注定”<sup>②</sup>，痛恨自己行凶失策，因内心拒绝索菲亚的传教而痛苦。他不幸的、远离宗教的、被上帝离弃的、对信仰无所坚守的苦楚，表现为对人输给上帝的羞赧。幸运的是，这种苦楚在感受西伯利亚监狱生活的过程中悄然化解，“正是在监狱里，他们比自由时更爱、更珍惜、更重视生活”<sup>③</sup>，使生活中最平常、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有了意义。因为，“囚犯心中所想象的自由，似乎比真正的自由（即现实生活中的那种自由）还要更自由”<sup>④</sup>，一草一木笼罩在上帝的神恩之下，对基督的信仰逐渐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心中蔓延开来：

从高高的岸上望去，周围一片广大的土地尽收眼底。一阵歌声远远地从对岸飘来，隐约可闻。那儿，在一片沐浴在阳光里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牧民的帐篷像一个个隐约可见的黑点。那里是自由的……仿佛亚伯拉罕的时代和他的畜群还没有过去。<sup>⑤</sup>

拉斯柯尔尼科夫从远离上帝的心境中逐渐解脱出来，对上帝的虔诚使处于苦难的西伯利亚感受到亚伯拉罕时代的幸福。类似的天国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的著作《死屋手记》（Записки из Мёртвого дома, 1861）中也有所描述，作家明确将其称为“上帝的世界”：

从这河岸上可以看见上帝的世界，看到晴朗、明净的远方，看那荒无人烟的自由的大草原……在河岸上，可以忘掉一切，你看着这无垠的、空虚的、广阔的天地，好像囚犯从狱窗内看着自由的世界一般……你审视了许久，终于看到吉尔吉斯人那个贫穷的、老旧的帐篷，看到帐篷旁

---

①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罪与罚》，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52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526-527页。

④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死屋手记》，耿济之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4页。

⑤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罪与罚》，第530页。

的炊烟，一个吉尔吉斯女人正围着两只绵羊在忙碌着。这一切是贫穷的、粗野的，但却是自由的。<sup>①</sup>

西伯利亚的苦役生活是没有自由并充满苦难的，愈是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人们愈是需要信仰的助力来度过艰难的岁月，天国想象就这样在可怜人的心灵慰藉需求中应运而生，是对信仰自发的唤醒。另外，从欧俄流放至西伯利亚的人们又是携带俄罗斯民族文化元素的移民者，“移民者是特定地理形象的积极建构者或传播者”<sup>②</sup>。流放引起的东正教思想流入，在西伯利亚的原住文化空间上建立起新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空间。因此，西伯利亚地理空间才能够在移民者坚守的理想与信仰中获得宗教和民族的意义，成为想象的天国。不仅如此，文化空间的建立有时会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唤醒人们对理想与信仰的意识，流放者中不乏贵族、知识分子等社会先进人士，他们携带的进步思想作为一种移动的文化空间，对社会底层的罪犯和普通平民的思想空间的介入，观照了西伯利亚闭塞的、绝望的苦役生活，使未开蒙的罪犯和平民有机会获得舍斯托夫（Л.И. Шестов）所说的超精神的“第二视力”。俄罗斯鞑靼女作家雅辛娜（Г.Ш. Яхина）在《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 2014）中描写的女主人公祖列依哈，就是在流放路上获得“第二视力”、进而实现信仰觉醒的，她曾四次睁开眼睛，并随之见到了更大的世界：

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四周漆黑一片，好像是身处地窖之中。<sup>③</sup>

大家像鼯鼠一样眯着一只眼睛，走出监狱的大门……眼睛很快便适应了白天的明媚阳光，于是，祖列依哈开始观察周围。<sup>④</sup>

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周围笼罩在黎明时分玫瑰色的烟霭之中，所有东西都显得模糊而缥缈。<sup>⑤</sup>

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阳光透过破旧印花布窗帘照射进来，在原木

---

①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死屋手记》，第234页。

② 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С.114.

③ [俄]古泽尔·雅辛娜著：《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张杰、谢云才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④ 同上，第151页。

⑤ [俄]古泽尔·雅辛娜著：《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第213页。

搭建的红褐色木房上爬行，在粗糙平纹布的、里面露出黑琴鸡黑色羽毛的枕头上爬行，继续向前——爬上优素福的小耳朵……<sup>①</sup>

第一次睁开眼睛，黑色解构了祖列依哈所处的时空，象征她对理想与信仰的无所知觉，“第二视力”的封闭使她心中本该拥有的信仰天国不知所终。从第二次睁开眼睛开始，祖列依哈一边经历着流放之路上的磨难，一边接受着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的医生、诗人、画家的影响，更大的世界开始出现在她眼前，这些有识之士在传播俄罗斯欧洲地理形象的同时，也宣传了其中的西方文化和先进思想，推动祖列依哈命运的转变。第三次睁开眼睛是在祖列依哈落水得救之后，曾经被指责不孕的她在与死神擦肩而过后不但活了下来，还孕育了新生命，她仿佛在安加拉河中经历了一次洗礼，随着第二次生命的获得，祖列依哈的精神蜕变也开始了。第四次睁开眼睛之时，她和儿子优素福在西伯利亚的苦役生活焕发出柔和的幸福的光彩，这种天国想象虽然是对现实的诗意化，甚至更大程度上是缥缈的希望中出现的幻影，但是，它的实质却是信仰的觉醒。晦暗的现实沐浴着希望之光，苦难在这一转化机制中成为发觉信仰的前逻辑。祖列依哈于西伯利亚苦难中完成信仰觉醒的过程，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西伯利亚流放情节尾声中所期待的故事，“一个新的故事，一个人逐渐再生的故事，一个他逐渐洗心革面、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sup>②</sup>理解苦难是得以在西伯利亚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钥匙，“凡是会解决生命之谜的几乎永远留在西伯利亚，愉快地在那里安居乐业……但是有些意志薄弱、不会解开生命之谜的人……满期后便立刻想法儿调走，跑回家去，骂着西伯利亚，讥笑着西伯利亚”。<sup>③</sup>天国想象反映了苦役文本的信仰之维，观照了流放者在特定历史文化空间内的精神状态，而那些“会解决生命之谜的”人们留在西伯利亚之后的生存状态，已经是我们在下一章节要探讨的问题。

---

① [俄]古泽尔·雅辛娜著：《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第378页。优素福是祖列依哈在前往西伯利亚服苦役的路上生下的孩子，是新生活 and 希望的象征。

②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罪与罚》，第532页。

③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死屋手记》，第3页。

#### 四、生态文本中的家园想象

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乡土文学（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sup>①</sup>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独特现象。作家们被失乐园的痛楚牵动，在追忆乡间故土、追求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歌颂自然、反思人性、探讨道德和生态伦理问题。代表作有：别洛夫的《平常琐事》（1966），阿勃拉莫夫的《兄弟姐妹》（1958），阿斯塔菲耶夫的《最后的鞠躬》（1957-1992）和《鱼王》（1972-1975），舒克申的《红莓》（1973）、《性格》（1973）和《朗月下的谈话》（1974），莫热耶夫的《费多尔·库兹明的生活》（1966）和《农夫们与农妇们》（1977），诺索夫的《乌斯维亚特的士兵》（1977），拉斯普京的《最后的期限》（1970）和《告别马焦拉》（1976）等。<sup>②</sup>其中，与西伯利亚相关的文学作品占据了半壁江山，尤其是阿斯塔菲耶夫、舒克申和拉斯普京等人的作品，不仅具备乡土文学的群体通性，更突出了西伯利亚生态文本区别于其他地理空间文本的个性特质，引领了 20 世纪 70 年代乡土文学的繁荣。西伯利亚乡村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乡村、庄园不同：前者地貌复杂多样，既因物产丰富而成为人间乐园，又因原始和寒冷而被视作世界尽头，是体量巨大、无法雕饰的神秘存在；后者以平原为主，存在更大的人为改造空间。虽然二者对于作家而言都象征珍藏记忆的精神归宿，但是西伯利亚蕴藏着无法预知的强大力量，使人心生敬畏。人栖居于此要顺应自然规律，更要深谙与之相关的道德、社会准则，自然与道德正是生态这一概念强调的两个重要向度。“生态（eco-）源于希腊语 οἶκος，最初用来指‘栖息地、房屋、住所、家园’……指生物体在自然界中栖息的状态。”<sup>③</sup>人在自然界中的栖息状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

---

① 在我国学术界，术语 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 有“乡村散文”、“乡村小说”、“乡土小说”、“乡土文学”等译法。该术语所涉及的文学作品不仅以俄罗斯农民为主人公，以展现俄罗斯乡村图景为写作目的，还流露出与农民、农村息息相关的本土意识。另外，проза 指非韵文文学（нестихотво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区别于诗歌（поэзия），详见 Ожегов С.И. и Шведова Н.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ООО «А ТЕМП», 2010. С.610. 因此，本文择取“乡土文学”作为术语 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 的译法。

② Николокин А.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М.: НПЦ «Интелвак», 2001. С.220.

③ 宋羽竹：“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东北亚外语研究》，2016年第4期，第22页。

面是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状态，即自然生态；另一方面是指人栖息于自然环境的精神状态，即道德生态。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不断改变栖息状态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无论是西伯利亚的原住民，还是移民至此的俄罗斯人，都依附着泰加林、叶尼塞河、贝加尔湖等山川河流而生，它们既是给予生命的母亲，又是庇护生命的家园，这些已经成为沉淀在西伯利亚生态文本中的集体无意识。苏联时期，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计后果的经济建设造成了西伯利亚乡村生态破坏、人口流失的悲剧，引发了作家们关于俄罗斯民族在这一地区可持续问题的思考。

对人与自然主客之争问题的探讨，是西伯利亚生态文本的书写路径之一。阿斯塔菲耶夫（В.П. Астафеев）是围绕这一问题著述生态文学作品的最佳代表，因为作家笔下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拥有强大力量的令人敬畏的西伯利亚大自然，收入文集《鱼王》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以此为题旨。在《葬后宴》（Поминки，1978）中，作家塑造了一个因作奸犯科服过刑、强壮得令人惧怕的名叫彼得鲁尼亚的人物形象。在与同伴打猎驼鹿时，如此魁梧骇人的彼得鲁尼亚却轻而易举地被熊撕得粉碎，观察驼鹿的同伴丝毫没有察觉熊对彼得鲁尼亚的攻击。熊是俄罗斯民族的图腾，在这里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人在熊面前，在俄罗斯原始森林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毫无对抗能力。彼得鲁尼亚死后，他的坟墓也在岁月光阴的变化中不知所终，“原始森林把一切都吞没了”。<sup>①</sup>人是自然空间的一部分，只可顺势而为，不可逆自然规律而行，这是阿斯塔菲耶夫的基本生态观，在《一滴水珠》（Капля，1978）中，作家明确过这一观点：

我们自以为是支配着自然界，要它怎么样就能怎么样。但是，当你一旦窥见了原始森林的真面目，在它里面待过并领略过它医治百病的好处之后，这种错觉就会不复存在，那时，你将震慑于它的威力，感受到它的寥廓虚空和伟大。<sup>②</sup>

这种“寥廓虚空”只有在西伯利亚这样庞大幽深的空间中才能够被切身

---

① [俄]阿斯塔菲耶夫著：《葬后宴》，顾蕴璞译，收入阿斯塔菲耶夫作品集《鱼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0页。

② [俄]阿斯塔菲耶夫著：《一滴水珠》，肖章译，收入阿斯塔菲耶夫作品集《鱼王》，第98页。

感受得到，恰如老子哲学中“道”的具象。《道德经》上篇第二十五章曾叙述过人与道之间的关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魏晋时期的哲学家王弼对“法”作了如下注释：“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sup>①</sup>人在土地上耕耘以维系生命的延续，土地有赖于天时，天时遵循客观规律。阿斯塔菲耶夫笔下原始森林中的“寥廓虚空”正是强大而无形的自然规律，人类与其所居的自然空间共生于彼此联系的自然规律之中，破坏自然与自戕毫无二致，这也是阿斯塔菲耶夫《鱼王》（Царь-рыба，1976）中捕鱼人与鱼儿之间的关系。鱼儿在捕鱼人的抓捕中身受重伤，捕鱼人在鱼儿的拖拽下险些丧命，当捕鱼人决定放掉鱼王，保密它的行踪，使它能够活下去的时候，捕鱼人自己不但身体轻松，内心也有“一种非理智所能透悟的解脱的感觉”。<sup>②</sup>如果将自然当作任由人类支配的客体去制服，无异于钳制人类本身。历史上的俄罗斯靠武力征服了西伯利亚，苦役中的人们靠信仰改造了西伯利亚，但是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征服不适用，改造也未必是万全之策，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某些不计生态破坏后果的改造也证明了这一点。“生态伦理强调，自然不是简单的‘物’，而是有思想的机体”<sup>③</sup>，“自然界它自己会在善恶之间制造平衡”<sup>④</sup>，任何将人类视为西伯利亚之主的狂妄行为都不可能将这里变成美好的家园。

基于上述对自然的认识，包括阿斯塔菲耶夫在内，许多与西伯利亚相关的文学作品，都关注到理想家园形象中的两个向度：自然生态与道德生态。通过宗教思想将二者结合起来，是西伯利亚生态书写的另一重要路径。拉斯普京（В.Г. Распутин）的《告别马焦拉》（Прощание с Матёрой，1976）是其中的代表作。作为自幼生长在西伯利亚的作家，拉斯普京与这一方水土的

---

① 王弼注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6页。

② [俄]阿斯塔菲耶夫著：《鱼王》，张介眉译，收入阿斯塔菲耶夫作品集《鱼王》，第288页。

③ 郑永旺：“自然不存，人之安在？——论生态伦理观照下《夜猎》中的反乌托邦图景”，《东北亚外语研究》，2016年第4期，第3页。

④ [俄]阿斯塔菲耶夫著：《达姆卡》，夏仲翼译，收入阿斯塔菲耶夫作品集《鱼王》，第188页。



亲缘关系，使他笔下的生态文本自然而然地赋予了这片土地母亲的身份。母亲通过受难来孕育和延续人类的生命，这与人类耕耘在大地上留下一道道伤痕之间存在联想机制。拉斯普京笔下的马焦拉不仅是作为地理空间的小岛，还是有生命的、有母性的小岛。马焦拉岛的俄文表述为Матёра，由мать（母亲）和течь（流淌）二词组合派生而来。正如亚当生于尘土，马焦拉的土地当为人之母，滋润这里的安加拉河是生命之源。马焦拉恰如《圣经》中人类的原始家园，“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sup>①</sup>在西方神话视域中，人类的家园是以树为基、以水为源的空间，树从大地之母得到给养，庇荫人类，水自天降雨露而来，意为神恩降临，维系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命。另外，作品中的岛主形象使马焦拉岛成为有思想的机体，延伸了作品的生态伦理意义。没有人见过岛主，然而岛主却深谙岛上的一切人和事，岛主形象反映了西伯利亚万物有灵的信仰，这是曾经生活在贝加尔湖地区和勒拿河流域的雅库特人、布里亚特人以及叶尼塞河以东地区的通古斯人的世界观。“认为人的周围有无数的神。山岭、森林、江河湖泊、树木花草、昆虫鸟兽，都有其主神。有的神是善神，有的是恶神。”<sup>②</sup>类似于岛主一样的自然神是有思想的大自然的象征，并作为一种历史的静观评判着人类的道德生态状况。马焦拉是西伯利亚生态的缩影，是俄罗斯民族意识中理想的家园形象，由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宗教观和道德准则，是西伯利亚家园的潜在规则。自阿瓦库姆时起，西伯利亚的自然便被描绘为“上帝的造物”。遵循这一逻辑，人们在西伯利亚自然中的栖居地当由神所赐。“创造”是上帝的权利，或者说，生态伦理就是上帝定下的不容置疑的规矩。如果人类掌握了对自然的操控权，那便是对上帝的僭越，必然受到惩罚。水电站的兴建截流了安加拉河，马焦拉面临被淹没的危机，神赐的家园被人类的行为破坏，村民离开小岛另觅居所，就像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定下的规矩，被赶出伊甸园，从此困顿劳苦。马焦拉之所以是理想的家园形象，首先是因为它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脉联系（供养生命的安加拉河和原始森林）。除此之外，它还与自然

---

① 《圣经·旧约》：《创世记》，2：8-2：10。

② 徐景学：《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神和上帝之间存在契约，受到庇护。当天然血脉被人为切断或人类背叛契约反客为主，那么必然遭到报应，这就是为什么一切离开了西伯利亚乡村的人们都走向了悲剧。在舒克申的《妻子送丈夫去巴黎》（Жена мужа в Париж провожала, 1971）中，主人公离开乡村之后的生活都是令人厌恶的，像城市展览馆里的机器一样毫无温度。“他开始思念自己的村子，思念母亲和小河，上班想，回家想，白天想，夜里想……他现在过的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荒唐、可耻和令人讨厌的日子……两手已经不会干活，心灵也已枯萎”。<sup>①</sup>在先钦（Р.В. Сенчин）的《淹没地带》（Зона затопления, 2015）中，原本搁置的水电站建设项目在拉斯普京去世的 2005 年又讽刺性地重新实施。迁居城市的村民们无法得到原本在山水间的安然生活，家庭的争吵以及社会问题充斥在他们城市生活中的每个角落，马焦拉的悲剧时时刻刻都在上演。

先钦在致敬拉斯普京的同时，关注到马焦拉的悲剧已经超出了原本的自然生态和道德生态问题。作为乡村悲剧续篇的城市悲剧，实际上已经不单纯反映家园破坏的问题，更是在质疑国家的治理。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在拉斯普京生前最后一部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Дочь Ивана, Мать Ивана, 2004）中，已经初露端倪。这部作品不囿于生态指涉的自然和道德两个方面，而是从空间政治学视域出发探讨生态伦理问题的解决出路。法国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在访谈中指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sup>②</sup>空间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维度，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的栖息状态。拉斯普京从凋敝的乡村和城市新居民窘迫的生活起笔，从乡村来到城市生活的女主人公塔玛拉一家人关系淡漠，女儿被强奸，诉诸法律却无法得到公正的判决，塔玛拉杀死强奸犯而入狱，一系列悲剧正是在续写后马焦拉时代——那些离开马焦拉之后移居城市生活的人们们的故事。这类生态文本超越了西方生态文学观点（建立在自然朴素与消费社会对立的基础之上，批判工业化造成的环境负面影

---

① [俄]舒克申著：《妻子送丈夫去巴黎》，张建华译，收入刘宗次编选的《舒克申短篇小说选》，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68页。

② [法]米歇尔·福柯、[美]保罗·雷比诺著：《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陈志梧译，收入包亚明主编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

响，挖掘自然的非功利价值。例如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法国作家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批判了生态破坏折射出的国家治理的不完善。拉斯普京通过西伯利亚自然之水与城市之水的对比，反映了人在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生存状态的反差：

我们都到河里去喝水……没有河流，没有我们的安加拉，谁都活不了。而所有河流都是从上帝的眼睛流过的。他注视着它们，从里面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从镜子里看一样。<sup>①</sup>

在城里的住家拧开水龙头，那因久置而变陈的冲力十足的水流，犹如找不到出口的困兽，从地狱般的水管中喷涌而出时……哪里有什么镜子？哪里有什么保护、救治？！……身体的病来自食品和水。<sup>②</sup>

河水既象征着自然对人类的物质供给，又象征着精神供给，自然家园中的神实质上是人的良心，衡量着人类的行为；城市里的水已经失去了神的观照，逾矩地肆虐正如兽性大发侵犯女性的罪人和失去平衡、难以控制的不公平的俄罗斯社会，良心的丧失带来的灾难除了身体的病痛外，还有精神的不安。老子曾在《道德经》中以水为喻，针对国家统治提出了“正善治”的理念，“为政之善，无矜无偏，如水之治，至清至平”。<sup>③</sup>换言之，良好的统治应当是“如水之治”，应当考虑到经济建设带来的后果，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自然的还是道德的，乡村的还是城市的，只有这样的治理才能够给离开马焦拉的人们一个新的家园，在这样的家园里，人与自然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善待，就像阿斯塔菲耶夫《俄罗斯田园颂》（Ода русскому огороду，1972）中最平实的瓜果蔬菜都能够得到的恰如其分的尊重：

时时处处都需要爱意。田园地里的活儿尤其需要悉心关怀。田园里的美好、舒适、明智会转化成整个家业的兴旺和安康。<sup>④</sup>

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末尾，塔玛拉的儿子伊万回到了塔玛拉

---

① [俄]瓦·拉斯普京著：《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石南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② 同上。

③ 王弼注释：《老子道德经注》，第22页。

④ [俄]阿斯塔菲耶夫著：《俄罗斯田园颂》，陈淑贤、张大本译，收入阿斯塔菲耶夫作品集《树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9页。

父亲伊万生活的乡村，守卫贝加尔湖，重筑教堂。来自安加拉河的风吹拂着刚出狱的塔玛拉，就像舒克申《红莓》中的叶戈尔，出狱返乡途中醉心于家乡的白桦，并在家园力量的支持下开始谋取人生的新出路。这样的时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善呈现出温暖和谐的样子。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018 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决定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角色和地位的不仅是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之前我已经提到，最重要的是人，是为每个人提供发展、自我实现和创造的条件。因此，关爱俄罗斯人民和公民的富足安康才是一切的根本。”<sup>①</sup>人本并非以人为主，而是要关注与人相关的自然环境、道德状况和治理模式，虽然老子时期的“统治”与今天的“治理”存在一定差距，老子的“善治”与当下西方的“善治”（good governance）也不尽相同，但是，“如水”般顺势而为、兼顾公平的治理理念，的确是西伯利亚生态文本的追求，也是俄罗斯在西伯利亚谋求发展的理想治理模式。

从东征文本（德米特里耶夫的颂诗《叶尔马克》等）到生态文本（阿斯塔菲耶夫的颂诗《俄罗斯田园颂》等），讴歌的对象从征服西伯利亚的所谓民族英雄，逐渐转变为在战争年代供养人们活下来的菜园。西伯利亚文本的关注重点从帝国走向家园，说明俄罗斯政权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战略从统治逐渐转变为治理。作家们希望西伯利亚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在生态伦理问题解决方案的探讨中为俄罗斯的国家治理献计献策，使数度无法在西方获得支持的俄罗斯觅得转向东方的出口。然而，这并非预示着俄罗斯将抛弃西学的帝国思维走上东顾的理想家园建设之路。西伯利亚生态文本中的家园想象与历史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谬逻辑，如果家园想象中的西伯利亚成为寄托民族未来的福地，那无异于宣布被征讨的他者之地反客为主，这既违背了“第三罗马”的崇高理想，又驳斥了俄罗斯的西方血统说。因此，西伯利亚文本诗意化的未来家园想象还很难在现实中得到实践。

---

<sup>①</sup>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05.06.2018.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 结语

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文本折射了现实，更诗意化了现实，有意识地建构了帝国、天国、家园形象，揭示了俄罗斯民族思维中特有的秘索思和虚空性。西伯利亚文本从历史文化、信仰、生态伦理等维度，阐释了西伯利亚地理空间在俄罗斯民族想象中的特殊性，诗意化想象的目的在于建构一个理想的西伯利亚形象。其中的内在逻辑是，即使这里曾有过侵略、苦役、破败……但是并不妨碍它被诗意化为伟大的帝国、自由的天国和善治的家园。这里潜藏着俄罗斯将文学视作民族文化软实力，并借此推进自身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国家意志。另外，从西伯利亚文本的历史文化维度到信仰、生态伦理维度，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文学善于深刻剖析人性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了国家意志的人本转向。但是，这也暴露了民族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些许脱节之处，诗意化的民族想象在引起民族兴奋和描绘西伯利亚发展的宏伟蓝图之时，拉开了理想西伯利亚形象与现实地理空间之间的距离。这一距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罗斯践行国家意愿的效果，诗意的想象美轮美奂，但执行力依然缺席。随着俄罗斯“向东看”战略的不断推进，西伯利亚会有更多的文化症候反映在文学之中，西伯利亚文本内涵的演变是我们应当持续关注的话题。

---

**【Abstract】** The spatial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renders people a chance to envisag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iberian text in terms of Russian literature researches. This text has been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Siberian issue since the 17<sup>th</sup> century, including writings on the eastern expedition, hard labor and ecology, which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iberian text respectively from history-cultural, belief and ecological ethical dimensions.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Siberia's being invaded, enslaved, and destructed are imagined, in the literary text, as the glory of empire, the resurrection of heaven, and the good governance in the homeland. The ideal Siberian image is consciously shaped in the manner of poetic image-construction, in ways such as mythologizing and sanct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spatial criticism and cultural geography theories, the gap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in the Siberian text and the reality in eastern Russia is expressed in the contrast between literary space and geographical space, revealing Russia's national will in demonstrating its cultural soft power by hiding its social problems through literary imagination.

**【Key Words】** Russian Siberia, Siberian Text, Siberian Image, Russian Literature

**【Аннотаци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й поворот в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позволяет людям постичь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ибир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носителем сибирской проблематики с XVII века до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Смысл сибир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может интерпретирова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в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ом и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м измерениях, но и с помощью понимания веры в Бога. Истор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похода в Сибирь, порабощения и покорения её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ся как имперская слава, воскресение рая и благ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родным очагом. Стало быть, писатели осознанно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ли идеальный образ Сибири путём поэтических способов создания образов, включая мифологизацию, возвышение и так далее. В свете геопро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й критики и теории культурн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не трудно заметить разницу между реаль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 воображённой Сибирью. Это объясняется лишь тем, что, пользуясь воображением Сибир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 образом, русские покрыва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тем самым демонтировал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волю и мягкую силу культу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ибирь, сибирский текст, образ Сибир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责任编辑 刘 军)